

吴明贤◎著

DUSHILUNXI

杜诗



论析



四川大学出版社

吴明贤◎著

DUSHILUNXI

杜诗

论析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庆梅
责任校对:王 冰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诗论析 / 吴明贤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14-5024-6

I. ①杜… II. ①吴… III. ①杜诗—文学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4464 号

书名 杜诗论析

著 者 吴明贤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024-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目 录

上篇 杜诗论	(1)
一、杜甫的儒家情怀	(1)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	(14)
三、杜甫性格中的“狂”	(27)
四、杜甫的诗兴特征	(42)
五、杜诗的议论手法	(53)
六、杜甫早年的诗歌	(64)
七、杜甫夔州农事诗	(73)
八、论杜甫与曹植	(88)
九、论杜甫与陈子昂	(100)
十、再论杜甫与陈子昂	(110)
十一、沈德潜及其杜诗观	(123)
十二、杜甫三首《望岳》之比较	(162)
十三、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考辨	(173)
十四、杜甫《赠花卿》辨析	(192)
下篇 杜诗析	(199)
一、房兵曹胡马	(199)
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01)
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209)

四、前出塞九首·····	(214)
五、述怀·····	(228)
六、彭衙行·····	(232)
七、赠卫八处士·····	(236)
八、秦州杂诗二十首（录二）·····	(239)
九、天末怀李白·····	(244)
十、江头五咏·····	(247)
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59)

上篇 杜诗论

一、杜甫的儒家情怀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近人钱穆《朱子新学案·大纲》亦云：“唐人无不能吟诗，但绝少能经……杜甫是儒家。”的确，杜甫既未皓首穷经，留下解经的著述；也没有斥佛排老，为捍卫儒家作出贡献。但杜甫却以他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树立了典范，以他宏伟壮丽的诗篇抒写了深厚博大的儒家情怀，笔者尝试论之。

—

杜甫出生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立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以下引杜诗，皆见此著，故只注篇名）的儒家政治理想。因此在他的许多诗文中往往离不开一个“儒”字，所谓“醇儒”、“硕儒”、“巨儒”、“腐儒”、“儒生”、“儒士”、“儒衣”、“儒冠”等等，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共有五十余处。透过杜甫对这些“儒”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杜甫诗文中的“儒”反映出了他心灵深处浓厚的儒家情怀。

杜甫常夸耀自己“圣人之后，世食旧德”（《祭远祖当阳君文》）的尊贵出身，总是以“儒”自豪。他不无骄傲地说“吾祖也……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看做是他的传家宝贝，把“奉儒”作为自己祖传不衰的“素业”。因而他“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丝毫不敢忘记儒术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时刻不敢背叛儒家“仁政”的宗旨。可见杜甫从小对儒家就是十分崇敬的，儒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常自我夸耀：“家声与令闻，时论以儒称。”（《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其祖父杜审言也以儒著称于世。杜甫在《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中写道：“鸾凤有铄翮，先儒曾抱麟。”把自己的祖先比作剪羽的凤凰和抱麟的孔丘。他还常常夸耀“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认为写诗是他们的家传本领；又说“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他从小作诗写文章都是以儒家典籍为依据的。杜甫甚至认为他们杜家宗族都有“质朴古人风”的传统，“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吾宗》），皆通经术而知君臣大义。因此当他获得一个能在皇帝身边侍候的左拾遗的小官的时候，他便喜不自禁地认为“此生遭圣代……蒙恩早厕儒”（《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以为自己遇到了圣明时代，早列儒行，可以继承“奉儒守官”的“素业”了。这说明杜甫虽迭遭挫折，身经乱离，漂泊不定，但他对儒家思想却始终笃信不疑，坚定不移。所谓“交态知浮俗，儒流不异门”（《赠虞十五司马》），他一直认为尽管世态炎凉、浮俗多变，但“儒流”却不应该走入异端邪门。可见杜甫的儒家情怀是始终如一、根深蒂固的。

杜甫是一个事业心十分强的人，他对那些有成就的人或尊敬

的人，往往以“儒”称颂之。他认为房琯“晚为醇儒，有大臣体”（《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房琯兵败罢相，为了疏救房琯，他曾向肃宗直言苦谏，不惜丢官坐牢。房琯死后，杜甫还写诗、写文对他进行哀悼。当他听到沈佺期的儿子沈东美得官的消息后，便马上写诗去叙通家之谊，颂扬其“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的出身，暗中亦不无自我表白之意。他赞扬宋玉“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他在《八哀诗》中更是对所尊敬的同时代人以“儒”进行颂扬。他称颂严武是“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痛心惋惜他英年早逝是“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他赞扬李邕“宗儒俎豆事”，称扬苏源明“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学问深厚不杂是因其“十载考坟典”，“庶以勤苦志”，好学苦读的结果。他夸赞郑虔“荥阳冠众儒”，“学立游夏上”，人品高洁而又学问深厚，“文传天下口，大字犹在榜。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诗文书画，才艺卓绝，将之拟为扬雄、东方朔、顾野王、钟繇父子。他还称颂汝阳王李璣“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杜甫对玄宗封西岳华山时，那些“鸿生巨儒之徒”能够“诵古史引时议”（《封西岳赋并序》）称叹不已，大加赞扬。

不难看出，杜甫把“儒”当做了实现理想的阶梯和完成事业的手段，其强烈的事业心正是建立在他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之上的，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不断地激励着他的功名欲望。因此，每当他要求别人引荐时，总是以“儒”推崇别人，对“儒”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杜甫为了求得玄宗女婿张垍的引荐，一面称颂这位“天上张公子”是“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紫诰仍兼馆，黄麻似六经”（《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地位尊贵，文翰优秀。一面又自轻自贱“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希望得到张垍的提拔。长安十年，杜甫生活艰

辛，曾多次干谒韦济，称颂韦济“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赠韦左丞丈济》），并称扬其以“经术”传世的“相门”家风。他曾先后多次赠诗给郑审和李子芳，要他们“恳谏留匡鼎，诸儒引伏虔”（《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希望郑、李二人给以引荐。后来杜甫从江陵移居公安，还特地写诗称赞当时做江陵少尹的郑审为“老儒”。可见杜甫多么希望以儒谋身、以儒治世。

尽管杜甫对儒家及其思想笃信不疑，对儒家的治世理想强烈追求，但唐王朝统治者却并未重用他。在政治上遭到碰壁之后，他往往又对“儒”表示不满，甚至借“儒”自嘲。天宝六年，玄宗“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元结《喻友》），李林甫压抑贤能，不准一人及第，使得自信非凡的杜甫落得个“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可怜处境。在此情况下，他发出了“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为自己和读书的儒生不被重用大鸣不平。此后他一直客居长安，虽多次求人引荐，却始终没有结果。因此，当他看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酒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世家大族高官厚禄，享乐奢侈，而像郑虔那样饱读儒家经典的人都遭到冷遇，甚至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再联想自己“被褐短窄鬓如丝”的可怜处境，不禁大声疾呼“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对自己的理想未能实现牢骚满腹，对孔丘死后居然同盗跖一样化为尘埃愤愤不平。这里杜甫虽然直呼了孔丘姓名，但我们却不能就此怀疑杜甫对孔子和儒术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动摇。因为就在此诗中，杜甫又愤怒地写道“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认为羲皇、屈、宋也和孔丘一样，虽“德尊一代”，“名垂万古”，然而也没有用，同样化为尘埃了。对于这一点，正如明人王嗣奭所说“此诗总属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辞，非真谓

垂名无用，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非真欲同寻醉乡也”（《杜诗详注》引）。安史之乱的爆发给那些从军入武、应募出征的战士提供了立功入仕的机会，对这种“王室比多艰，高官多武臣”的现实，杜甫一方面表示羡慕，另一方面又为“儒”的命运不济表示惋惜，所谓“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送韦十六评事同谷郡防御判官》）等等皆是，认为“儒术诚难起”（《奉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从这些半是牢骚不平，半是叹息哀婉的诗句中不难看出，尽管杜甫因战乱漂泊流离，过着“儒衣山鸟怪”（《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的贫窘流浪生活，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更没有动摇他“奉儒”的决心和“素业”。

二

主张仁政德治，这是杜甫儒家情怀在政治上的体现。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转变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历史的灾难，目睹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杜甫认为“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只有儒家的德治、仁政才能挽救时局，改变现状，使唐王朝“中兴”。因而他极力主张“秉周礼”、“体仁恕”，要以德治国，从上至下“君臣重修德”（《伤春》五首其五），“贤者贵为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圣哲体仁恕”（《壮游》），才能达到“再使风俗淳”的国泰民安的治世境界。

推行德治仁政就必须反对土地兼并，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减轻人民负担，所以杜甫主张“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

“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安史之乱前，以李林甫、杨国忠为代表的唐王朝统治者一方面敲骨吸髓地剥削劳动人民（“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另一方面又骄奢淫逸，挥霍享乐（“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造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更与豪门大户相勾结，兼并土地，“豪俗兼有其地而转富”；失地的农民“近者交互其乡村”、“远者漂寓诸州县”，他们“只与兼并豪家力田”，因而流离失所。均田制不复存在，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形成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悲惨景象（《东西两川说》）。“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戎马不知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人口锐减，百姓苦不堪言。“偏裨限酒肉，卒伍单衣裳”（《入衡州》），军队亦缺衣少粮，从而也影响了平叛和抗御外族入侵的战争。杜甫认识到“谷者百姓之本”（《说旱》），“谷者所以阜俗匡时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因而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严厉地指斥那些豪强官吏“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夔州抒怀四十韵》），“奈何黠吏徒，鱼夺成逋逃”（《遣遇》）。谴责他们“众官务割剥”“索钱多门户”“诛求多门户”“刻薄及锥刀”，只知“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壮游》），根本不懂得发展农业生产，也不顾惜百姓的死活，“不暇忧反侧”，更不顾及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因而使得劳动人民“丧乱纷嗷嗷”“百姓日支离”，致使“吁嗟乎苍生，稼穡不可救”。所以他主张“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蠹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严惩贪官污吏，剪除“黠吏”豪强，使政治清明。他提出“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但均亩薄敛，则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

（《东西两川说》），认为官吏应廉洁自守，赋税要公平合理，才能使民生安定。他甚至喊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的呼声，要求“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朱凤行》）。也就是让“蝼蚁”们有吃的而“鸱枭”们倒霉，显然这是要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从而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

推行德治仁政必然要反对严刑峻法，主张社会和谐，所以杜甫主张“治国用轻刑”（《奉赠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和风日冲融”（《往在》）。杜甫认为“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述古》三首之二），严酷苛虐的刑法，只会给老百姓带来伤害。“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奉赠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聪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并不需要严法酷刑，面对庶民百姓，反倒应减轻刑法。因而他希望官吏们在“举劾”时要“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黑白”（《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不要黑白混淆，是非不分，滥杀无辜，有“负明义”。杜甫认为只要做到“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只要官民各司其职，人们安居乐业，消除战争，男耕女织，那就会达到“中兴似国初，继体同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的和谐社会。因此杜甫主张应以忠孝治理国家，“明明君臣契”“孝理敦国政”（《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宣扬要明于君臣之道，将忠孝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他认为“自古存忠孝”，人们只要做到“委曲承颜体（指孝），骞飞报主身（指忠）”（《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就能实现报国治民的理想。所以他十分推崇孟氏“承颜胼手足”（《孟氏》），能尽孝道，颂扬卫伯玉忠孝两全，母子均得到朝廷的封赏。和孟子一样，杜甫推崇仁爱，认为“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因此他讨

厌鸡食虫蚁伤生害命，准备捉去卖掉。但当他看到“鸡被缚急相喧呼”，卖掉的鸡仍不免“还遭烹”时，心中又不忍，故“叱奴解其缚”（《缚鸡行》），这与孟子“君子远庖厨”的思想完全一致。以此出发，杜甫总是推己及人，将仁爱惠及天下“生常免租税，名不逮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湏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仁者爱人”的崇高境界，这种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无疑正是杜甫和谐社会理念的思想基础，亦是其儒家情怀的具体体现。

“国须行战伐”（《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推行德治仁政就一定要以战去战，坚持正义的战争，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首先，杜甫反对藩镇割据的分裂战争，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史之乱前，他向统治者发出警告“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后出塞》），揭露安史之徒准备叛乱的阴谋活动，“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号召人们要做好斗争的准备。安史之乱后，杜甫“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送韦十六评事同谷郡防御判官》），积极参与抗敌的斗争。他认为平叛就是“恭行天罚”，因而“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武将应挥戈向前，“垂泪方投笔，伤时即据鞍”（《送杨六判官使西蕃》），文者也应投笔从戎，“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群众亦应积极参加战斗。他告诫守城的将士“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请嘱防边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吏》），希望唐军不要仓促出战，而要等待时机进行反攻。在唐军节节胜利进逼长安时，他甚至建议分兵直捣叛贼老巢“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

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北征》）。他主张“伐叛必全惩”（《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斩鲸辽海波”（《观兵》），要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叛军。

其次，杜甫既反对外族入侵的不义战争，也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主张民族融和。安史之乱使得边防空虚，吐蕃、回纥趁机入侵，甚至使得代宗出奔。对此杜甫主张坚决而有效的抵抗，“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建都十二韵》），希望有精兵良将打败来犯之敌，“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冬狩行》）。他支持和鼓励严武出师收复失地，“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扬旗》）。希望朝廷任用像汉代霍去病那样的大将去制敌取胜，“汉朝频选将，应拜霍嫫姚”（《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其二）。他呼唤君王像汉高祖刘邦指挥猛士镇守四方一样守卫疆土，“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伤春》其五）。警告入侵者“北极朝廷终不改，西方寇盗莫相侵”（《登楼》），要他们不要猖獗侵扰，无端生事。但同时，杜甫亦反对唐王朝开边拓土的黩武战争。他对玄宗前期频频发动战争欺凌少数民族的行为深为不满，指出“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后出塞》其三），为了邀功请赏，边将们不惜“百万攻一城”“尺土负百夫”（《遣怀》），在“两蕃静无虞”的情况下，“献捷日继踵”（《后出塞》其四），不仅恶化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深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造成了“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又上后园山脚》），“千村万落生荆杞”，“禾生垅亩无东西”的凋零惨相，从而导致了分裂战争的爆发。他谴责“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认为“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其六）。明确地表示了不应以战争去开边拓土，主张民族之间应和睦相处，“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唐王朝与吐蕃都不应抛弃“舅甥和好”的和睦友好政策，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也是杜甫德治仁政的重要内容。

三

“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和自比“稷契”的大臣怀抱是杜甫儒家情怀的又一具体体现。

儒家主张“祖述尧舜”，而杜甫一生也始终把“致君尧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的终极目标，他曾明确地表示“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甚至他还以此来勉励别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登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要求朋友为实现这一理想也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还赞扬元结“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同元使君〈春陵行〉》），使君主恢复尧舜时代的政治，使民风淳厚朴实，仿佛远古社会那样。这无疑是对朋友的希望，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和期许，可见“祖述尧舜”的儒家主张对杜甫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真可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杜甫的心目中，唐尧虞舜始终是“德尊一代”的理想的圣明君主，“昔在尧四岳”（《赠李十五丈别》），“尧有四岳明至理”（《寄裴施州》）。据《尚书·尧典》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他命令羲氏与和氏，遵循上天的旨意，依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来规定历法，教导人民按时令节气安排生产。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四人（就是所谓“四岳”）分别掌管东、南、西、北四方，“允釐百工，庶绩咸熙”，设置百官之职，使一切事情都可以顺利进行。这就是“尧有四岳明至理”，即通晓治国理民的最高道理，使百姓按季节安排农事、发展生产，天下便可安定。杜甫又说：“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述古》其二）《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谓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

之人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尧不能举而舜举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故也。”八元八愷十六人作为舜的辅佐，同心协力，以农为本致治，思想高妙，使天下安定和谐，对此杜甫是十分称赏的。“步趾咏唐虞”（《赠郑十八》），“不忘舜讴歌”（《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一），“元听舜日旧箫韶”（《夔州歌十绝句》其三），唐虞之世完全是杜甫心目中的理想治世。因而杜甫希望唐王朝也像尧舜时代一样“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其五），成为一个德治仁政的和谐社会。杜甫特别推崇唐太宗，他说自己“尝读唐《实录》”（《别张十三建封》），曾经仔细地阅读过唐开国以来历代编年大事记的《实录》，“密论贞观体”（《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与人详细地讨论过贞观时国家的体制，明确地认识到唐初以来“百余年间未灾变”的原因是由于实行了“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二首其二），即儒家德治仁政，因而“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正因为“秦王拨乱姿，一剑总兵符”（《别张十三建封》），太宗拨乱反正，高度集中统一，任贤使能，发展生产，这才使得天下安定，百姓富足。所以他认为“贞观是元龟”（《夔府书怀四十韵》），贞观之治成为天下大治的标本典范，“天尊属尧典，神功协禹谟”（《行次昭陵》）。太宗就是当代的尧舜大禹，他直呼“回首叫虞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将高祖太宗称为虞舜。他强烈地希望当时的君主也能“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继承唐初“贞观之治”的国家体制。杜甫亦推崇武后，认为武后“临轩御乾坤”后“端拱纳谏诤”，敢于引用“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直言之臣，因而形成了“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的良好风气，不仅“家声与令闻，时论以儒称”，自己的祖父能够立于朝廷，而且“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闻丘师兄》），英才毕集，贤者云聚，显然这也是具

有尧舜之时的气象的。杜甫亦推崇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历历》），开元时期的开明政治，仿佛展现在自己的眼前，那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期。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二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识。”其时百姓富庶，人口繁荣，农业丰收，仓库充实，男耕女织，各得其宜，天下安定，社会和谐，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诚如仇兆鳌所说：“此追思开元盛世。当时既庶而富，盗息民安，刑政平，风俗厚，制礼作乐，几于贞观之治。”（《杜诗详注》卷十三）。正因为如此，杜甫总是希望当时的君主都像尧舜那样圣明。尽管玄宗（后期）、肃宗、代宗都不免有些昏庸无能，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他们充满信心，将他们视之为“北辰”“太阳”，认为“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哀王孙》），自己“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第二十），还是以尧舜期许他们，望他们“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有感》五首其三），勇于改革，成为中兴之主，使“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把唐初以来太宗开创的辉煌帝业重新树立起来并使之更为宏伟盛大。

杜甫始终持有“稷契”的大臣怀抱，“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稷指后稷，周之祖先，教民耕种；契，殷之祖先，推行文化教育，两人都是古代辅佐君主的贤臣。稷契怀抱，实际上就是儒家以民为本，为天下人的安宁幸福而奉献自己的思想。《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心怀，是“仁者爱人”的具体体现，这在杜甫的诗中举